

城市空间与工人阶级早期形成史的重塑^{*}

——评卡茨纳尔逊的《马克思主义与城市》

王志刚

美国城市社会学者艾拉·卡茨纳尔逊 (Ira Katznelson) 现任哥伦比亚政治科学与历史学讲座教授,1966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69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12年被任命为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卡茨纳尔逊长期从事城市和工人阶级形成方面的研究工作,1980年代出版《城市战壕:城市政治与美国阶级形成的模式》等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92)一书中,卡茨纳尔逊通过回溯与重建19世纪工人阶级早期形成史,提醒我们“阶级斗争”要获得自身意义,就必须根植于阶级形成的空间化过程,根植于国家在城市舞台上的新角色及其效果。其贡献在于试图通过城市空间这个概念中介,弥合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主流社会学长期存在的存在/意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行动、必然/偶然等二元概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建构一种富有穿透力的、空间化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质上,卡茨纳尔逊走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边界,表

征着城市社会地理学、社会阶级研究的一次“实在论”转向。

正如卡茨纳尔逊所强调的那样,阶级是一个多面相的概念,在复杂的阶级研究中,存在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阶级结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走向的理论抽象,但如今日益遭到西方学者的质疑。在分析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时,地域、空间、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纷纷替代阶级成为解释的关键性变量。阶级是否是一个经济范畴?我们还生活在阶级社会吗?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否两极化以及阶级斗争是否必然发生等一系列问题被人们重新提了出来。卡茨纳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中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触及了社会理论和政治规划的一个难题——现代工人阶级的形成问题。他本人力图建构一种空间化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在理解城市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4MLC00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72002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了“江苏大学青年骨干教师工程项目”的资助。

问题上的可能性和疏忽,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分析工程:(1)对历史时代变迁的思考;(2)对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积累过程的分析;(3)对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向前发展。本文着重讨论卡茨纳尔逊对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的重建及其理论旨趣。

一、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及其难题

按照卡茨纳尔逊的解释,马克思力图详细说明三个相互联系的理论工程以实现西方社会历史的宏大建构。^①首先,马克思力图建构一种历史理论以阐释大规模的时代变迁。在区分出前阶级社会、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后阶级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同时,马克思通过聚焦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对人类历史的演进脉络进行解释。这一工程的关键概念是生产方式,关键问题是内在于生产方式中的规律,正是这些规律主宰了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变迁。其次,马克思努力构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下经济发展的解释框架。在这一工程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的经济逻辑理论化,包括资本与无产阶级的日益分化、贫困的集中、劳动力储备大军的发展、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以及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等。卡茨纳尔逊认为,如果马克思第一理论工程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源和最终灭亡,那么第二工程则通过对内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资本逻辑转型规则的详细分析,将超越资本主义置于一种预言之下,即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短暂的生产方式,这既是因为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导致了一种深层的、不可控的增殖危机,也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的第三个工程是试图建构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这个理论工程不是对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层面的解释,而是为了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是将资本主义当作时代的整体加以理解。第三个工程要求以如下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耦合作为前提条件:一方面,对前两个工程的结构和逻辑展开分析;另一方面,对人类的能动性和事物变化的偶然性保持敏感性。卡茨纳尔逊认为,在《资本论》内部,已有一种有关结构和能动性关系的解释模式,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结构就是“结构化条件下追求独立目的的理性个人所创造的”^②,这些理性的个体在奴役性的结构限制中实现自己的生存。卡茨纳尔逊认为,《资本论》没有对阶级形成进行详细的分析,所谓的阶级只是出现于“经济基础”上,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的给定物。换言之,在从前两个工程向第三个理论工程的转变中,有关唯物主义与决定因素、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等问题被提了出来。

在卡茨纳尔逊看来,马克思主义传统最难驾驭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前两个工程的“逻辑—结构”的陈述整合到第三个工程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资本论》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国家,而是以一种高于地方和时间的方式来处理上述问题”^③。换言之,马克思的诸多文本提供了一些暗示和例证,但对联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与能动性的机制并没有提供详细的说明,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两个不同平台”问题,^④尽管像其他社会理论一样,马克思主义努力弥合结构与历史、抽象与具体、必然与偶然等领域的张力。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理论主张就是它拥有能力描绘结构与主体的辩证法:其一,

通过生产方式概念对结构进行详细阐述;其二,将阶级形成确定为能动性的枢纽。”^⑤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恰恰就是论证和说明这些选择,寻求在两个目标之间自由的穿梭。因此,社会理论的目标不能仅限于理解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或日常生活,而是要弄清因果决定因素、结构和能动性的关系与链接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只要能与特殊情境中主体的自觉行为联系起来,就会成为历史性的时刻。但20世纪已经发生了太多这样的时刻,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似乎为西方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抛弃资本主义体系的机会。但是在任何地方,这些可能性都没有成为现实。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案例都证明是资本主义一次新的重建,其标志是发现了新的积累之路,创造了可以复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新的社会知识和公共政策。在资本主义的不断重组过程中,西方工人阶级已经与资本主义达成了和解,并且在某些时候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忠诚。随着无产阶级履行肩负的历史任务的反复失败,资本主义逐渐地因为种种危机而得以长存,有学者甚至称资本主义是一种以灾难和危机为重生契机的“灾难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最早出自娜奥米·克莱因2009年版的《休克疗法: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

卡茨纳尔逊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这一方面少有着墨。无论是因为像《资本论》的第三卷结尾所说的那样耗尽了时间,还是因为将阶级形成问题当作理所当然,马克思的文本没有预见到这种可能性:一旦现代工人阶级适应了资本主义的存在,他们就有可能放弃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努力。由于这一问题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是如此根本,西方马克思主

义学者力图打破马克思主义的沉默。他们要么越来越多地对马克思的阶级结构作出复杂的结构性说明,如埃里克·奥林·赖特(Eric Olin Wright)重视对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说明,要么以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首创的方式撰写全国工人阶级的详瞻历史。卡茨纳尔逊认为他们的著作只能部分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难题,因为他们始终没有与“阶级本身和为阶级本身”等问题决裂。马克思主义依然摆脱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工人阶级的社会存在及其社会意识之间的关联,证明不仅在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范畴方面比期望的更不可预料,而且能够支持一种没有相应的‘革命意识’的坚定的阶级意识。……此外,在缺乏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重建也提出了阶级创造社会主义社会核心群体之基础的可持续问题。因此,缺乏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重重联结的连贯一致和令人信服的说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对结构和能动性研究的最薄弱特征,而且本身就是政治无力的一个根源。”^⑥

二、社会理论的城市空间维度

缺乏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而行动的意愿,以及阶级范畴图绘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的能力受到挑战,这种孪生烦恼给马克思主义学者带来了解释困境。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对的第一种策略是尝试在社会性别、工人贵族、种族划分、社会压迫和社会控制、权力寻租、文化霸权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寻找阶级意识生成的障碍。第二种策略是聚焦于阶级结构本身,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兴起。这是目前阶级分析

的焦点,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非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过时落伍的一个镜像。^⑦第三种策略是将特殊时间和特殊地点的工人阶级的软弱无力解释为被统治阶级战胜的历史,或工人阶级领导层背叛的历史。第四种策略是西欧和北美的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介入主流社会民主和改革政治的组织、意识形态和纲领中,彰显它们自身的妥协和社会整合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是否拥有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指南的持续适用性,在直接的意义上就基于它能否为人们对于工人阶级的失望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卡茨纳尔逊开出的处方是建构一种空间化的、富有穿透力的马克思主义,以讨论阶级斗争的历史缺席问题,并考察工人阶级认同的衰退和城市人工环境的变化之间的关联。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内社会理论的主要问题聚焦于工人阶级的形成,那么最好将这一主题当作一个城市问题。因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空间诉求塑造了19世纪城市的增长模式、人工环境和社会地理。反过来,19世纪城市的经验以及尝试弄清其特性的企图,是西方工人阶级早期历史中的决定因素。^⑧

众所周知,人们总是生活在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创造物的社会空间之中。在这些因时间和地点而有差异地建构出的空间世界里,人们体验社会秩序,阐释社会秩序,并围绕社会秩序而斗争。卡茨纳尔逊认为,人与真实世界的相互作用也就是与他们生活的空间维度的相互作用,这是涉及结构与能动性在内的所有社会理论的一个构成要素,也是大规模的社会进程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一个调节因素。假如社会理论能让空间成为理解社会关系的结构化过

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从中受益,那么没有城市地理学的维度就想充分揭示19世纪劳动阶级的形成问题是不可能的。在卡茨纳尔逊看来,阶级形成是一个涉及双重意义的经验进程:对世界的经验和学会如何在世界之中行动的过程。任何人都不是与普遍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相遇,或是与抽象商品形式打交道。资本主义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地点与特定的时间之中。19世纪的工人阶级所体验的世界主要是城市世界。这些“在地形式”(shapes on the ground)是阶级形成的重要内容,因此,对劳工阶级形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劳工阶级生存和工作于其中的空间形态和精神地图的研究。^⑨

约翰·阿格纽(John A. Agnew)曾对空间与地方作出界定:首先指“场景”(locale),即建构社会关系所处的背景;其次是场所(location),包含着社会相互作用背景的地理区域,由更大范围的社会和经济进程加以界定;最后是地方感(sense of place),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空间的情绪情感。^⑩卡茨纳尔逊认为阿格纽明确无误地赞成地方视角对阶级分析的重要性,将地方理解为“能动性在其中呼唤社会结构的地理语境或位置”^⑪。正是在这种映像的建构中,人以群分的社会经验获得了命名。至于它们是如何获得命名的,并且对集体行动来说具有何种功能,构成了阶级形成至关重要的问题。

卡茨纳尔逊据此批评因为没有通过19世纪壮观的城市化所生成的人工环境——工人阶级个人、家庭与资本主义日常遭遇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创造的是一种“纸板式的工人阶级”——尽管在存在方式和地点上都难以详细说明,却希望工人阶级克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和集

体行动的障碍。当工人阶级没有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则为他们制造种种借口:劳动贵族、父权制、种族多样性、精英的社会控制、国家的压抑等等。这些理想的劳动阶级独立地存在于理论家们的头脑之中,这些理论家往往遗忘了欧文·豪(Irving Howe)的警句“劳动阶级是一种现实,无产阶级是一种观念。”^⑫卡茨纳尔逊委婉地批评了恩格斯的阶级形成理论,他说“在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代,他认为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他错了。从资本主义城市中劳动人民的生活处境到他们崛起为一个共同具有抵制社会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群体,其间不存在任何不可避免性,阶级的形成不是作为定量的事情、或多或少出现的东西。它是一个偶然的进程,其条件和内容因地方差异而有所不同。”^⑬

从19世纪英美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出发,卡茨纳尔逊提出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组织所设想的形式是相同的,但其倾向和内容却迥然不同。在美国,一种分裂意识逐渐地分化了工人阶级:在工厂是劳动者,在他们的居住区则是种族群体的成员;而在英国,阶级不论是在工厂领域还是在脱离工作场所的居住区域都能团结起来。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十分需要将一种“城市—空间的想象”灌输到劳动阶级形成的分析之中。这样一种尝试,在卡茨纳尔逊看来起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步骤:(a)详述城市增长和发展的结构性决定因素;(b)呈现这些新的空间塑形的特点;(c)对工人阶级如何理解西方不同的空间作出系统的和比较的说明。”^⑭当然,通读《马克思主义与城市》这部著作,我们发现卡茨纳尔逊在(a)(b)方面阐释

不足,在第三个方面做了一定的思考。

三、工人阶级形成史中的空间分析与组织分析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地理学的内部描绘出各社会阶级之间的空间界限,有助于确定工人阶级成员住宅的相似性以及与其他阶级的空间隔离。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城市的空间化逐渐结晶为一种现代形式,其典型特征是工作场所和家鲜明的区分——工作场所和住宅的距离之远近随着工人阶级可利用公共交通的方便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这种固化过程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构成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它正视了此前工人阶级通过了解社会空间而精心编制起来的独特的城市图谱,从而在一种新的环境中重新认识阶级;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市场的全国化,工人阶级共有一种超越特定地方性命运共同体的感觉,并随着交流和交通显著增长、新网络的建立成为可能,阶级和空间之间的关联因此越来越复杂多变。^⑮

通过掌握这一双重进程,卡茨纳尔逊认为我们能够解释一个挥之不去的谜题:尽管建构了强有力的工会和政党组织,也对资本主义的统治发起了挑战,并慷慨激昂地宣示了社会主义,但无论是分裂的意识还是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式变得政治化。正如克利萨·库玛在一篇告诫性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史的这种断裂,必定引起一种温和的进化论的怀疑——这种解释认为,阶级诞生之初的工匠工人阶级与19世纪末非熟练与半熟练工厂劳动者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连续性。”^⑯

为什么从工匠特性向无产阶级特性的转变必定会让工人阶级缴械呢?库玛的观点是,新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跨越空间界限铸造成同盟而注定不会走的太远。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在《阶级、地方和工业革命》中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马克思的著作存在一种尖锐划分:对资本积累的逻辑说明和对社会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描述。前者将阶级斗争视为内在于工作场所的抽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后者假定了这种阶级斗争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势在必行地发生。卡尔霍恩断言,两者的迷失都在于既没有对城市作出空间上的特定研究,也缺乏一种组织分析——“这种分析坚持工人阶级直面资本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机制和范围”^⑦。卡尔霍恩坚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能力,那么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的。

在卡茨纳尔逊看来,卡尔霍恩的贡献在于将阶级形成的组织分析和空间分析结合到一起。为了在资本主义所派生的阶级斗争中脱颖而出,卡尔霍恩坚称“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积累的相同层次上组织起来。”^⑧但其存在着两个悖论。其一,正是在受到困扰的工匠群体最愿意挑战资本特权的时候,他们缺乏这样去做的交通和交往的基础。从协作和交流的组织视角看,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意义的阶级斗争只有在19世纪末才变得可能。其二,正是在完全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获得了自身必要的基础结构之时,它逐渐受到了工会和政党等机构组织命令的束缚,并且由于这些组织陷入了获利的可能性之中,众多工会和政党都以短期和功利的方式追求阶级利益。阶级斗争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或

至少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部分”^⑨。

在卡茨纳尔逊看来,这两个悖论引人深思但并不十全十美,它们低估了地方与全国、直接与间接之间的整体联系,没有基于它们与城市模式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对新型组织的不同潜力作出任何比较分析。^⑩毫无异议,城市依然是现代工人阶级政治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考虑到更早的19世纪的城市映像,工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这些挑战作出回应。19世纪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展开的全部集体行动都受到了本世纪以及更早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形成模式的限制。工会的抱负大小,它们与政党的关联,对资本主义的再现及其动员追随者的能力,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阶级形成的第一时期的模式及其结果。而工人阶级早期的分裂意识,在19世纪通过城市生活中工作场所与家之间的空间分化得到了再生产。其结果是将工会引向了回避政党政治的工场劳工主义,与此同时,也将政党引上了在非阶级认同基础之上对工人进行动员的道路。简言之,有组织的革命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谈论和争执工作场所与社区的分离的措辞所决定的。

以美国为例。1970年代以后,南欧和东欧移民大规模入境。新来者的居住地被建构成有别于工作场所的城市世界之后,使城市邻里街区种族关系的混杂更为显著,同时也为工厂跨种族的劳工管理层的斗争中增添了许多内容。比如,一些学者对世纪之交底特律城市的研究捕捉到了新的城市环境的特点以及它们对工人阶级提出的挑战。奥利弗·祖兹(Olivier Zunz)的《不平等的变脸》通过聚焦邻里街区、家和住宅市场,提出工人阶级的工厂与居住地之间与日俱增的分离使种族邻里街区成

为“共同体的空间停泊地”，“城市大被褥的主要色彩”，移民区因此成为相对自主的环境。工人阶级因种族特征和地方而四分五裂。但“由于种族纽带在工业化进程中依然是如此强劲有力，尽管存在极端不平等的情况，美国的社会结构依然摆脱了有组织的阶级冲突的威胁”^{②1}。正像这一时期的英国，劳工组织利用交通和通信技术将分散各地的地方工会联合在一起。这些变化都涉及城市空间的结构化过程和国家的城市舞台上的新角色。

假如社会地理的重大变化激起了对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新解读，那么对城市空间的塑造同样也不再是以高度独立性运作的资本的特权。国家在塑造城市环境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迫使工人阶级将工作场所与家的空间分离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直面资本家的市场问题，而且是直面国家和市政服务的政治问题。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新资本主义，已不再赋予资本以第一次革命中那种典型的自主性。政治经济学家所开出的自由市场的处方证明是不可承受的，因为民主政治产生了驯化繁荣与破产的循环圈、缓和市场和地方粗暴运作的运动。此外，当资本主义的规模和范围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都得到增长时，国家形成了对市场进行调节的政策，城市治理在资本积累与政治权力相互冲突的张力中对空间进行重新塑造。^{②2}城市增长越来越不是资本逻辑直接强加的问题，而是越来越有计划的国家干预的产物。道路建设、贫民区的拆迁、卫生和水的基础设施的提供，诸如此类，都是政治化的，而关注这些目标的是形形色色的社会阶级。卡茨纳尔逊认为不注意这些问题，工人阶级新的组织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成功地动员工人，因为它们已成为新的阶级认知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确

切的意义上，更为熟悉的地方层面与更为遥远的全国组织层次之间的联系，界定了工人阶级政治生活的措辞与内容。^{②3}

四、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思考阶级问题

19世纪末社会科学开始兴起，同时伴随着学科本身性质的持续争议。这种学科方法论之争与事实/价值、行动/结构、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一系列二元划分密切相关，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并诞生了两种相互冲突的社会理论模型，即实证主义/定量模型和解释学/定性模型。在20世纪50、60年代早期的英美社会理论中，实证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范式坚持认为，社会理论是对世界上可观察的客观事物的研究，而不是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关心世界本质的先验理论。实证主义的反对者则批驳说，社会事实不可能被客观地确定下来，它们总是依赖于理论，也总是被社会建构起来的。尽管学界认为范式之争已经结束，但事实上在有关阶级的争论中，它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尤其对卡茨纳尔逊而言，阶级把结构与行动这种二元性结合在一个单一的概念之内。

马克思提出，一个阶级只有在它意识到自己的本真状况时才会形成。这种对人类意识和阶级意识发生的描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之所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4}从这一解释中可以得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洞见：其一，决定人类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是经济基础；其二，物质

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这种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后来逐步成为一个广泛争议的主题。马克思因此被指责为经济还原主义——断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的发展。在他逝世后,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应当被解释为经济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原因。相反,他论证说,尽管经济可能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在任何特定时刻,其他各种社会关系——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关系——也会影响人类行动。然而,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恩格斯的干预而终结。

正是基于这种争论,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两大派别: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厄里(John Urry)认为这些派别是“对正统社会学内部已经遭遇的问题的复制”^⑤,即结构与行动之争。一方面,强调人类行动(能动性)对于解释社会制度和现象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这种行动探究所批判的社会功能主义或结构决定论解释。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分视为一个再轻易不过地就能用某种决定论方式加以解释的隐喻,就像社会学中的行动探究法一样,人类行动者被赋予一种核心角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和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秉持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强调识别和描述阶级结构的首位重要性。

可以认为,行动/结构之争把因果解释问题置于核心位置。简单地说,人类行为应该被认为主要是反应性的吗?或者说人类行为是由人类始终如一地置身于其中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所施加压力的结果吗?在整个1980年代,关于结构与主体的这种争

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中一直持续地进行着。但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阶级结构的分化和阶级矛盾的缓和,西方许多学者开始质疑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认为他过多地强调经济的决定性意义,而牺牲了民族、性别、地区、族群这样的其他的竞争性社会认同来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发展出许多阶级研究的方法,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坚持阶级自身的能动性建构(阶级形成)。就像瑟尔本(Goran Therborn)所写的那样,“决不能认为阶级获得其原初形态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质构造,而必须要把阶级视为始终处于形成、再生产、再形成和变形的永恒过程之中的现象”^⑥——即坚持行动在自在阶级的构成中的作用。

卡茨纳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中提出马克思理论的三大工程,实质上,前两个工程相当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第三个工程“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主要讨论的就是阶级政治和阶级形成问题。这是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之外来讨论阶级问题,标志着一种社会地理学、社会阶级的“实在论”转向。我们知道,哲学实在论由于批判实证主义而变得日益具有影响力。实在论并不拒斥自然科学模型,但是它认为经验规则本身并没有设定我们知识的全部范围。各种现实状况也并非持续不断地并列存在,相反,因果解释必须根据产生这些状况的因果机制来回答它们为什么存在的问题。这样,实在论就不仅把注意力引向各种事件,而且还引向产生这些事件的基础过程或机制。就阶级研究而言,实在论的解释往往聚焦于阶级的形成,尤其把它的主要经验研究焦点集中于形成的过程,而不是对阶级结构的描述。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实在论重视对各种特定的原因性力量的偶然性和多

维性的强调。卡茨纳尔逊基于不同国家的城市空间案例分析,提出阶级形成是一个偶然和异变的过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生成截然不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形成模式,这种阶级的空间映射就是一种社会地理学的实在论研究方法。

总而言之,卡茨纳尔逊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中探讨了城市空间的物质性及其意义,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空间的联姻、地理空间得以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特殊方式是如何显著地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有助于解决其最紧迫的某些问题的。他让我们体会到,塑造早期工人阶级认同、动机和行动的阶级范畴的形成远比恩格斯当年所预见的更不可预料。在19世纪以来的阶级形成史的任何阶段,无产阶级都没有完成向社会主义转变所派定给他们的充当社会变迁代理人的任务。到20世纪晚期,当资本主义明确在全球范围得到重构时,阶级范畴本身的意义更加受到质疑。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的联姻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战斗精神只存在于理论领域,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去思考目前阶级和群体形成的模式。当然,最后要提出的是,尽管当代社会变迁快速而剧烈,我们仍然不应当急于抛弃马克思的阶级研究方法,必须认识到,他分析社会的阶级概念及其构建的阶级分析的相关基本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坚守。■

注 释

- ①⑥⑦⑧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4、249、250、195页。
- ②⑤⑨⑩⑬⑭⑮⑰⑱⑲⑳㉑㉒㉓ Ira Katznelson, *Marxism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3, p. 55, p. 58, pp. 204 - 205, p. 205, p. 208, p.

207, p. 266, p. 267, pp. 270 - 271, p. 281, p. 282.

- ③ Perry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4, p. 7.
- ⑩ John A. Agnew,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 Boston, MA: Allen & Unwin, 1987, pp. 1 - 20.
- ⑫ Irving Howe, "Sweet and Sour Notes: On Workers Intellectuals" *Dissent*, Winter, 1972, p. 264.
- ⑬ Krishan Kumar, "Class and Political A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Archives Europeennes de Sociologie* 24(1), 1983, p. 18.
- ⑭⑰ Craig Calhoun, "Class, Place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Nigel Thrift and Peter Williams(eds.), *Class and Space: The Making of Urban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1987, p. 51, pp. 52 - 77.
- ⑱ Olivier Zunz, *The Changing Face of Inequality: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migrants in Detroit, 1880 - 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 178.
- 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 ㉑ John Urry,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The Economy,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Macmillan: London / Basingstoke, 1981, p. 8.
- ㉒ Goran Therborn, "Why Some Classes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Others", *New Left Review*, 138, March - April, 1983, p. 39.

[王志刚: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 宋阳旨)